

《童幼教育》与明清之际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导入

肖 朗

(浙江大学 教育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明清之际, 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知识等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和耶稣会士的来华而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教育也随之被导入。艾儒略撰写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就是两部众所周知的代表作。相比之下, 高一志撰写的《童幼教育》却鲜为人知, 也未经学界充分研讨。从历史上看, 它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之始, 也堪称中国古代儿童教育论著百花园中的奇葩。

[关键词] 高一志; 《童幼教育》; 西方儿童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5)05-0085-09

中国有着古老悠久的文明, 重教兴学是其优良传统之一。中国古代教育在其演变、发展的过程中, 始终极为重视儿童教育, 形成了丰富的儿童教育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就曾阐发过各自的儿童教育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既出现了贾谊的《新书·胎教》、王充的《论衡·命义》等论述胎教及优生的著作, 又产生了孔臧的《戒子书》、司马谈的《命子迁》、疏广的《教子文》、王褒的《幼训》等探讨家庭幼儿教育理论的著作, 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则集此前家庭幼儿教育理论之大成, 成为后人施行儿童教育的宝典。

到了隋唐以后, 伴随着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体制、科举制及宋明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 一方面, 科举童子科得以设立, 私塾、塾馆、蒙馆、村塾、家塾、义塾等各类学塾更加健全和完备, 《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小学》、《名物蒙求》等童蒙教材相继编订问世; 另一方面, 以训蒙和家训著作为代表的儿童教育论著也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 代表作如《训蒙法》、《家塾常仪》、《童蒙训》、《程董二先生学则》、《幼仪杂箴》等, 至于张载、朱熹、王阳明、吕坤、张履祥等教育家更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中国古代儿童教育思想。

明清之际, 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在导入和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及教育的同时, 也十分注重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教育遗产, 并试图将中西教育思想和理论融于一炉。高一志(A. Vagnoni)的《童幼教育》就是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一部介绍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专著, 它可谓明清之际儿童教育论著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然而, 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对《童幼教育》未能加以必要的重视和充分的研讨, 在中国教育史及幼儿教育史的先期性研究成果中该书多被忽略, 而有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论著对此也往往语焉不详。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童幼教育》的主要内容、观点及其研究方

[收稿日期] 2004-10-2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BAA010043)

[作者简介] 肖朗(1958-), 男, 江苏苏州人, 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研究及中外文化教育的比较研究。

法、特点等作一初步探讨。

一、高一志的生平与著述

高一志,原名王丰肃,1566年生于意大利特罗法雷洛。他早年在耶稣会学校中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曾在米兰教授哲学3年。1603年,他与其他传教士数人一起赴东亚传教,两年后抵澳门,后至南京。“初入中国之四年,一志精研中国语言文字,欧罗巴人鲜有能及之者,因是撰作甚多,颇为中国文士所叹赏。^[1](p.88)据记载,当时在南京受他劝说而入教者甚多,并于1611年建立起南京城第一座天主教教堂。1616年“南京教案”爆发,他被投入狱,后被逐出南京,与庞迪我(D. de Pantoja)、熊三拔(S. de Ursis)、曾德昭(A. de Semedo)等来华耶稣会士一起流亡澳门。^[2](pp.261-268)。在澳期间,高一志曾任教于澳门圣保禄学院(College of St. Paul, Macao)教授神学等课程。“南京教案”平息之后,他于1624年重返中国内地,并被派往山西传教,从此改名高一志。在山西绛州(今新绛)他曾为当地士绅韩云和韩霖受洗,后来在这兄弟俩的帮助下发展教徒,并建立了育婴堂。1640年,高一志病逝于绛州。

高一志被逐流放澳门之际,澳门圣保禄学院建立尚为时不久,其前身是1565年耶稣会创办的圣保禄公学。作为一所招收葡人子弟及华人教友子女为主的初等学校,圣保禄公学最初仅教授儿童读书与写字,数年后增设拉丁文课程,此外还讲授算术等课。然而,这一时期包括圣保禄公学在内的澳门教育机构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居民接受教育的要求,也不能适应耶稣会培养传教士的需要。在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 Valignani)主持下,圣保禄学院在圣保禄公学的基础上扩而大之,遂于1594年正式成立。关于学校的学科与课程设置,成立当年出版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有过记载。该年报云:“至今,我们有四个学部。第一是教授阅读、写字的儿童学部;第二是文法学部;第三是人文学部,这是今年才增设的;第四是伦理神学部。”^[3](p.80)1596年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中提到修辞学和各种文学练习,1598年的《澳门圣保禄学院年报》中又提到学院设有神学、拉丁文、哲学、人文学、伦理道德课程以及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I. Loyola)的《神操》课等。可见,在圣保禄学院中,不仅整个课程体系偏重于人文学科,而且还保留着进行启蒙教育的“儿童学部”。据有关文献可知《童幼教育》于1620年刻印行世,^[1](p.95)其时高一志正生活在澳门。在圣保禄学院教授神学等课程的同时,他潜心于儿童教育方面的研究和著述,这种努力符合圣保禄学院学科与课程之要求,对促进整个学校教育及教学活动的开展无疑也有重要意义。当时澳门学校教育重视儿童教育思想及理论的研究还反映于下述事实,即早在1588年,澳门圣保禄公学就刊印了耶稣会士玻尼法爵(I. Bonifacio)神父撰写的《基督教儿童教育》一书^[4]。

高一志生前著述颇丰,涉及神学、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据著名宗教史学家巴尔托利(D. Bartoli)称:“中国传教会中诸神甫深为教内教外人同倾服爱敬者,除利玛窦外,无能逾于一志者也。”^[1](p.94)从总体上看,较之明清之际其他来华耶稣会士,高一志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伦理道德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融合中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以求其会通。高一志曾把西方哲学分为“性理之学”和“义礼之学”两部分,前者包括探讨自然界的物理学等,后者包括探讨人类社会的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或许因为高一志看到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对西方的“性理之学”已多有论述,所以他自己则主要论述西方的“义礼之学”,这一点,正如他在《修身西学义礼西学大旨》中所说的:“二三友陈性理之学,余进而述义礼之学焉。”^[5](p.218)。1624年,高一志重返中国内地后,即译撰刊印了《修身西学》(又名《西学修身》)、《齐家西学》(又名《西学齐家》)以及《西学治平》、《民治西学》等书,其中《修身西学》和《齐家西学》堪称伦理学著作。

《修身西学》根据1595年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出版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讲义》编译而

成^{[6] p.37)}凡10卷,卷一至卷三讲的是一般伦理问题,如善、恶、爱欲等,属于基督教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卷四至卷一〇主要讲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属于基督教伦理道德思想的内容。古希腊柏拉图曾提出:人的理想的道德境界应包含“聪明”、“勇敢”、“克己”、“正直”这四种德性,后亚里士多德又作了发挥和补充,基督教伦理道德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种观点。基督教伦理道德学说在讨论个人道德时讲所谓“四达德”,即“智”、“义”、“勇”、“节”。《修身西学》卷四至卷一〇就是围绕这“四达德”而展开的。卷六是其总论部分,对德作了一个总的介绍,卷七讲“智德”,主要是为了说明道德的选择是合理性的,合于规律的,卷一〇讲“义德”,所谓“义德”,是指为善德作出牺牲而在所不辞,表现了一种为道德理想而杀身成仁的气概,卷九所讲的“毅德”即“勇”,卷四和卷八所讲的“廉德”即“节”就是指对自己情欲的克制,人的自然本能无非“饮食男女”,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认为对此应加以克制^{[7] pp.112-113)}。

《齐家西学》共两卷,卷之一含有“定偶”、“择妇”、“正职”、“和睦”、“全和”、“夫箴”、“妇箴”、“偕老”、“再婚”等十章。依据宋明理学家将儒家学说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模式,《齐家西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修身之学备矣,次以齐家^{[8] p.493)}之观点。书中接着又说:“厥属有夫妇、子女、仆婢、甸徒(应为‘佃徒’——笔者注)之四者理,家乃齐焉。^{[8] p.493)}依此推之,完整的家庭伦理自然由此四者构成,而“夫妇之理”首当其冲,因而,《齐家西学》卷之一的总标题即为“齐夫妇”。“定偶”第一章中进一步分析道:“有夫妇,然后有子女;有夫妇子女,然后内而仆婢,外而佃徒,种种家务起焉。是故夫之家之本也,必有正则互守,定职互敬焉,如筑室先树基也。盖造物主从太初时定之矣。厥初生人,止一男一女,配为夫妇,令传类为万民宗主,伉俪实定于此。^{[8] p.494)}因此,根据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规范,作者明确表示不赞同中国封建家庭一夫多妻制的形式,认为这有悖于造物主的“原旨^{[8] p.495)}。至于夫妻关系,西方家庭虽然是“男主外,女主内,内外有别”,但妇必随夫,主次分明,一切仍由丈夫做主。高一志说:“然外内虽各为主,而女阴男阳,妇必从夫,以为起居之表焉。古博学之士布路大(今译普鲁塔克——笔者注)尝曰:妇虽贵且尊,一室之权,悉系于夫也。正如酒与水合,酒为主,存色与力。^{[8] p.503)}这正与中国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相一致。另外,儒家对妇女有“三从四德”的要求,曹大家《女诫》中就有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之四德。高一志认为,西方对妇女也有类似的要求。他在“妇箴第七章”中说:“贤妇之节,古哲约之以五:一毋好饰,二毋好游,三毋好言,四毋好闲,五毋好奢。^{[8] p.518)}《齐家西学》卷之二接着又说:“夫妇之学已明,次以生育,而教子之道当讲矣。余既以童幼教育书别行,实齐家西学一大支也。^{[8] p.537)}换言之,讲完“夫妇之理”,当讲“子女之理”,而其中以讲如何教育童幼为主,因此,卷之二的总标题即为“齐童幼”,所包含的十节也就是《童幼教育》卷之上的内容。

由此可见,从《修身西学》到《齐家西学》,高一志在系统介绍西方伦理道德思想时,采用了一整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概念,并尽量附和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至于《童幼教育》成为《齐家西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则说明高一志介绍西方儿童教育思想时是以西方伦理道德为思想背景和理论基础的,而极力融合中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意图也贯穿于《童幼教育》一书的始终。

二、《童幼教育》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童幼教育》分上下两卷,卷之上含“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等十节;卷之下含“缄默”、“言信”、“文学”、“正书”、“西学”、“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等十节。就总体而言,高一志视“教育”为“齐家”之一

环,以父母、师长作为教育的主体,在“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等节中主要论述了教育的方法、步骤等问题,侧重于对施教者提出若干具体的要求,而在“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缄默”、“言信”、“文学”、“正书”、“西学”、“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等节中,主要论述了教育的内容、范围等问题,侧重于对作为受教者的子女及童幼提出若干具体的要求。可以说《童幼教育》分别从教和学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儿童教育的各个方面及环节,并在此过程中介绍和导入了西方儿童教育思想。

首先《童幼教育》强调了优生优育对儿童成长发育的重要性。在西方历史上,柏拉图是最早探讨优生问题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继而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立法者对教育首先应考虑的是婚配问题。亚里士多德说道:“年轻男女双方的结合对于生儿育女是不利的,因为在所有其他动物中,年轻的双亲新生的后代都发育不全、体格弱小,且多为雌性。故人类的情况也不会例外。”^{[9] p.265}他又指出:“父亲年纪太大,就会像过于年轻的父亲一样,生下的子女在身体和心智两方面都发育不良。”^{[9] p.267}因此,他既反对早婚,也不赞成过晚生育。《童幼教育》中说:“吾西先哲定婚配之时,男以三旬,女以二旬,今虽不尽依古法,然亦未甚相远。男女当是时血气清凝,足以生养,心志光明,足以教训。”^{[10] p.250}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出发,《童幼教育》指出:“尝观早娶者或数年不产,或所产之子弱不能存”,何况“夫妇童幼,未能治身,安能教子”^{[10] p.249}。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M. F. Quintilianus)十分重视婴儿的优生问题,主张要慎选保姆,如果可能,应选择受过教育的妇女;应注意的首要问题是她们的道德,同时她们使用的语言也必须正确,因为保姆会在习惯和语言方面影响婴儿。《童幼教育》主张母亲应亲自哺乳育儿,如使用乳母则应慎择之。“盖首欲择其善怀抱者而不苟且,次欲其不迷于酒、不病于言,盖多色多酒之母生乳极浊,食之者不但禀体之薄,尤沾其恶病焉。若其言必欲正,实不使讹言淫声溺子于邪,故不得已而。”^{[10] p.263}中世纪西方贵族女子一般不亲自哺乳,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一反这个传统,提倡用母乳哺育婴儿,如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威吉乌斯(M. Vegius)在《儿童教育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用母乳哺育等建议^{[11] p.5}。可见,就儿童的优生优育而言,《童幼教育》既接受了古希腊罗马教育家某些合理的观点,又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其次《童幼教育》突出了父母和教师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教之主第三”节指出:“怀抱之功既成,为之父者,教不可不早也。束格辣德(今译苏格拉底——笔者注)古学宗领,尝谓幼之教育根于父母。”^{[10] p.265}古希腊罗马教育家尤其重视父亲身为子女的榜样力量。如古罗马历史学家、教育家普鲁塔克(Plutarch)在《论儿童教育》一文中就指出:“父亲们所应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本身应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情,避免邪恶的习惯。他们的生活本身如同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就培养了孩子对恶言恶行的厌恶。”^{[12] p.260}《童幼教育》要求:“君子先教其子习之于学问,渐进之于道德,然后美赏令闻丰爵,皆可致也。”并说:“吾西古俗,用人先审其家之教育,然后或进或黜焉。”^{[10] p.270}不过,较之父母,《童幼教育》更重视教师对儿童教育所发挥的作用。书中写道:“智者或称师为吾二父焉,或以为补全父母之恩焉。盖父母生我,使我游于世,而贤师教我,使我游于道;父母生我,必属我于世苦,而贤师导我,乃援我于诸苦;父母生我,未能使我不死,而贤师教我,乃使我道吾德不败灭也。罢辣多(今译柏拉图——笔者注)上古大贤也,尝谓:天主之广泽、父母之养育、贤师之教习三者必不可测,并不可报。岂不信哉。”^{[10] pp.271-272}据此,《童幼教育》引用普鲁塔克的话,批评世间有些父母吝啬钱财、不愿多花钱聘请好教师,并对为人父母者予以劝导。书曰:“积货不若训子,供室不若供师。盖财盛而子无教,则室将倾矣。故亲之知道者,但有子先计其师,然后计其货也。”^{[10] pp.277-278}与此同时,《童幼教育》由教师而学校,在“西学第五”节等

章节中侧重介绍了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学校教育的有关情况^①。

再次《童幼教育》极为关注儿童教育的方法及教材问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方面十分重视感觉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率先提出并论证了“白板说”,即认为人心犹如“白板”或“蜡块”,知识来源于人的感觉及后天经验。普鲁塔克将这种认识论观点运用于儿童教育,认为儿童极易受到后天环境及其教育的影响;“正如在软蜡上容易打上印记,儿童的头脑也易于接受在这个年龄给予的教育”(12 I p.244)。《童幼教育》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夫童之心若蜡焉,印之易于成迹。”(10 I p.281)因此,它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方法的正确与否,并认为其关键在于“言传身教”两个方面。“教之法第五”节开篇即予点明:“父师之教维何?曰言曰身。”(10 I p.279)接着进一步分析道:“童幼初闻之邪声究竟难忘,则智父明师必须正言立训,乃可以教子也。虽然,身教尤急焉……色搨加(今译塞涅卡——笔者注)尝谓:‘言道纤曲遥而迟,行之难;身道径直近而速,游之易。’”(10 I pp.281-282)因此《童幼教育》强调了父母和教师“以身作则”这一基本的教育方法:“亲师之贤智者,先求诸身,然后求诸子。盖教多成乎信,亲师不行所言反好其所禁,学者能信之乎?不信而学可进乎?色搨加尝云:‘乱斯世者,莫若师之善言而不善行者。’”(10 I p.286)在此方法指导下《童幼教育》又论述了以下几种教育方法及原则:

1. 赏罚分明。“教之翼第六”节中把“赏罚”比作教育的两翼:“先哲尝谓:赏罚之于教育也,如鸟双翼,如舟双桨,二者废一不可也。”(10 I p.288)批评那些没有做到“赏罚分明”的父母和教师:“亲之溺爱者不忍责其子之恶,使恶念日长而美质病;师之过严者不奖掖其童之善,使善志时屈而学业衰。”(10 I pp.287-288)继而强调“赏罚”必须适度,尤其惩罚“或过于严,不审于愆之大小,不察于气之殊禀,而漫刑焉,皆非也。”(10 I p.293)。《童幼教育》遂举西方一则传统的比喻道:“风与太阳争力强弱,试解人衣。风先暴起击人之体,似欲强夺其衣裳者,而人愈谨持其衣;而太阳不然,旁射其光薰入肌骨,使人不觉袒裼。风遂让太阳为胜。”(10 I p.294)以此说明儿童教育应以劝导为主。

2. 劳逸结合。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认识到游戏是符合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活动,因而在儿童教育中具有重大意义;古罗马时代,昆体良、普鲁塔克等人进一步主张开展儿童教育应注意劳逸结合;到了文艺复兴时代,许多人文主义教育家更是从发展儿童的个性出发强调了这一点。《童幼教育》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传统,视“劳逸结合”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法。“闲戏第十”节中认为:“人性如弓,一张一弛,皆堪修缮,岂能恒用力于正业乎?若幼之气质犹弱,心志未坚,则非闲戏间之,弗能久也……故先知者虽严于幼学,然以理量其力,必使舒泰,或宽逞颜色,而从其当然之戏也。”(10 I pp.414-416)《童幼教育》对游戏的内容和方式指出:“可抚琴也,可歌谣也,可作诗也,可习奕也,可蹴鞠也,可较射也,可击剑也,可骑驰也。”(10 I p.419)但无论休闲还是游戏,都宜适度,不应过分;特别是游戏《童幼教育》引用了西方古人的名言:“幼之嬉戏,有道必坚其体而养其志,非道则溺其体而散其心。”(10 I p.420)

此外《童幼教育》对教育儿童时选择使用教材的问题也予以相当的重视。柏拉图认为,教育儿童应先教音乐和故事,他重视给儿童讲故事,尤其重视选择适当的故事作为儿童教育的教材。他说:“我们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13 I p.71)又说:“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10 I p.73)可以说,柏拉图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精选儿童教材的教育家。《童幼教育》中写道:“罢辣多大贤常戒乳母,勿使乱述虚传及井市邪言。”(10 I p.281)又说道:“罢辣多尝于邪书之害,譬之毒泉流行,推万民而毙之。”(10 I p.365)强调父母和教师必须选用好书作为儿童教育的教材。

^① 关于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学校教育的导入,详情可参阅肖朗《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2期。

三、《童幼教育》的研究方法及特点

综上所述《童幼教育》分别从教和学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儿童教育的各个方面及环节：既论述了身体的养育，又论述了精神的教育；既涉及家庭教育，又涉及学校教育；既注重儿童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儿童道德的培养；既关心儿童的读书学习，又关心儿童的日常生活，充分体现了教育的精神和本质。著名学者徐宗泽曾称赞道：“此书自胎教以至成人，为完备一人人格之教育都言之矣。每题中先言教育之理，继述譬喻、故事，以显明之，是以读之不觉枯燥。”^{〔5〕}（p.217）从总体上看，《童幼教育》在论述儿童教育时，其研究方法反映出了如下特点：

其一，中国古代由于学校教育不够发达和普及，学龄期以前的幼儿教育在整个儿童教育中占重要地位，即使学龄期的儿童也往往在家塾接受塾师的教育，与此相应，家庭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因此，中国古代教育家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往往集中在8岁以前的幼儿教育阶段，以“家训”为主题的家庭幼儿教育论著也较为常见。《童幼教育》则有所不同，首先“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等章节从结婚、受孕讲到胎教、养育，父母始终是儿童教育问题的中心；继而“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又论述了教师和学校对儿童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实例说明“善师之功大矣哉，夫以贤德之亲不能攻其子之恶，而贤师之教能攻之，师不急乎哉”^{〔10〕}（p.273）的道理，并相应地介绍了西方学校教育的有关情况。可见《童幼教育》在论述儿童教育时，既注重父母的作用，又强调教师的影响，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于一体，较为明显地表现出两者并重的特点，这可能与高一志等耶稣会士大都自幼接受过教会教育及耶稣会学校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其二，如前所述，高一志曾翻译和撰写了《修身西学》、《齐家西学》等介绍和导入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著作，而《童幼教育》可谓这些著作的延伸。正如韩霖在其序中所指出的：“其厄弟加之学（即伦理学——笔者注），译言修齐治平者，为斐禄所费亚（即哲学——笔者注）之第五支，童幼教育又齐家中一支也。”^{〔14〕}（p.239）事实上，《齐家西学》卷之二即收录了《童幼教育》的卷之上，表明《童幼教育》是在《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所阐述和宣扬的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正因为如此，《童幼教育》尽管论述了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但其中心和重点则是儿童的道德教育。“学之始第七”节开宗明义地指出：“凡学贵以序而进焉，则先立乎其本，而后及其末。本者，仁也，修齐之根而诸善之母也，则始学体仁者，径道也。”^{〔10〕}（p.295）“洁身”、“知耻”、“缄默”、“言信”等节固然讲的是儿童教育所应注重的道德规范，而“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等节也通过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及环节来论述儿童的行为规范。毫无疑问，一方面，这符合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宗旨及特征，特别是与朱熹等理学家的儿童教育观相吻合；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时期西方教会教育及耶稣会学校教育的特点是宣扬基督教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儿童教育观。因此，《童幼教育》承认“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这一中国传统之五伦为儿童道德教育的重点，同时又强调：“仁之学又本于天主，即以敬畏天主为首功，盖吾之所当爱及所当敬者，莫大莫尊故也。圣经云：知之始畏主。江河原出于洋，而终归入于洋。人性原系于天主，则人始学返其本根、终归天主者，义也。”^{〔10〕}（p.295）《童幼教育》还介绍了西方一些国家有关这方面的教育情况：“昔承大贤之教，勤于教业，使其幼者先学畏事至尊上主，次使念前贤圣之功德，终使习于律法。或问大贤之意，答曰：幼者知事上主而后行圣贤之道，不难；行圣贤之道而后齐家治国，何难之有？”^{〔10〕}（p.297）于是，结论为“事天主为事君事亲之本矣”^{〔10〕}（p.300）。不过，《童幼教育》又认为“敬主孝亲”为道德之根本，也是儿童道德教育之始基。书中写道：“幼者既立仁学而本于事天主，必当进于事亲矣。盖子于父母最亲，其受父母之恩亦最重，则敬天主之后而孝二亲乃天理人情之

至切者也。故造化主置十条目以治下民,而孝敬父母系于奉敬天主之后,冠于和睦世人之首焉。^{¶ 10 ¶ pp.304-305}进而要求:“训诲幼时,不但所生当孝敬也,又推广其仁而自天主以至于郡伯师长之属,皆孝敬之内,外尽其恭焉。^{¶ 10 ¶ pp.314-315}显然,这种强调“敬主事亲”的儿童教育思想与中国古代以“忠孝”为本的儿童教育思想有所不同,这无疑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道德教育特别是耶稣会学校所开展的基督教道德教育的特点。

其三《童幼教育》主要是一部介绍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著作,同时,它也吸纳了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某些观点,这一点首先反映在上述的写作内容方面,其次也反映在它的写作形式方面。书中广泛引用了《圣经》以及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芝诺(Zeno)、塞涅卡(Seneca)、普鲁塔克、马可·奥勒留(M. Aurelius)、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依纳爵·罗耀拉等人的语录和西方传统的格言、典故,列举了西方历史上许多名人受教成长的故事,并试图借鉴和利用中国的教育概念来解释西方的教育思想,明显地表现出作者试图融合中西方儿童教育思想所作出的努力。

四、余 论

《童幼教育》刊印于澳门,高一志重返中国内地后也随之传入。《四库全书总目》中未列入《童幼教育》,仅列入高一志论述“火”、“气”、“水”、“土”四元素说的《空际格致》^{¶ 15 ¶ p.1081},但事实表明:《童幼教育》及其所导入的西方儿童教育思想仍然引起了明清之际知识阶层的关注。韩霖为《童幼教育》作序并编撰《铎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韩霖,字雨公,山西绛州人,入天主教后教名多默。年轻时随父寓居松江府(今上海),曾就读于青浦县。1621年参加乡试而中举人。尝从徐光启学兵法,并向高一志习西洋炮术,因谙熟兵法而闻名。韩霖一家均奉天主教。其兄韩云,字景伯,1612年中举。年轻时亦受业于徐光启而“颇闻兵法绪余”,历任徐州知州等职。由于韩家人缘周济,财力雄厚,高一志等耶稣会士遂得以在山西各地迅速开展传教活动。韩霖生前著书多部,并曾为《童幼教育》作序。序中写道:“惟西儒之学与吾儒同。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妊子有胎教,生子择于保姆,与可者而师之,自能食能言,至出就外傅,其教诲之序节目之,详若《戴记》、《弟子职》诸书斑斑可考。当时治隆风美,率是道也。^{¶ 14 ¶ pp.239-240}但他认识到《童幼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来阐述西方儿童教育思想。因而他指出:“此非独童幼书也,修齐治平尽在是矣。^{¶ 14 ¶ p.239}进而认为:“先生之言于晦翁(即朱熹——笔者注)之书亦多符合,但其蠹好辞于重舌,探藏理于终古,非独后生之模范,盖亦前觉之功臣矣,而敬畏天主尤西来第一宗旨,晦翁敬身之篇尚隔一层……虽谓此书为厄弟加之全书可也。^{¶ 14 ¶ pp.241-242}”

与此相关,韩霖曾撰《铎书》,韩云等人校订,刻于1641年。徐宗泽评介道:“是书取明太祖(即朱元璋——笔者注)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笔者注),以中西古近圣贤之说,逐条分梳,演绎详解,而一本于敬天爱人之旨。^{¶ 5 ¶ p.138}全书按上述“圣谕六言”分为六个部分,其中“教训子孙”部分大量引用《童幼教育》而加以发挥,并认为《童幼教育》阐发的“敬畏天主”之理,可“补小学(指朱熹编订的《小学》——笔者注)之阙者也。^{¶ 16 ¶ p.721}翰林院侍读学士写的《铎书》序”中,也誉之为“识时救世之论也。^{¶ 16 ¶ p.599}”可见,当时知识阶层中的部分人士颇能接受《童幼教育》所导入的西方儿童教育思想,并肯定了高一志在融合中西方教育思想方面所进行的尝试。

《童幼教育》为近人所发现而加以重视。1919年,著名教育家马相伯曾为之作跋^{¶ 17 ¶ p.155}。在《童幼教育跋》中马相伯说明了该书发现之经过:“古绎韩子铎书,盖借明祖训言,发挥天国实义;引用西儒处,发挥尤透辟,以余所见,大较韩子手订也。陈君援庵(即陈垣先生——笔者

注),春初已付重刊,刊成辄尽,至再至三,今且四版矣。及闻有童幼教育抄本,以其引用最多,故又亟索另抄,以便加入…….所惜徐汇书楼(即徐家汇天主教辅藏书楼——笔者注)抄本甚劣,有因形似音似而讹者,更有因妄改而讹者,费数日之心目力,校阅一过,粗粗可解,爰跋数语,邮寄陈君。^[18](p.245)马相伯还本着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精神揭示其意义道:“夫幼童教育者,即家庭教育也;家庭者,人身人类之生存地…….普天万恶之生,实由无家庭教育始,此古人所以言治国,必先言保赤,次言宜家,而后始言教国人欤?益信国人之教,自家庭始,家庭之教自一夫一妇始,不然,子异母,母异宠,操戈不遑,教育何有?溯自春秋以来,王家为甚,富家亦然。是一家犹不能和,何望一国之共和?亟应取韩序所谓厄弟加者,由家而乡,由乡而县,由县之小团体合成数县数百县之大团体,而后共和庶有望乎?”^[18](p.245)今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童幼教育》无疑是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其导入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意义尚有待学界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 考 文 献]

- [1]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曾德昭.大中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 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M].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
- [4] Ioanne Bonifacio. Christiani Pveri Institvtio Adolescentiae qv[M]. Macao, 1588.
- [5]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 方豪.明末传入的西洋教育[J].东方杂志,1975(5)32-39.
- [7]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8] 高一志.齐家西学[M].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C].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
- [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10] 高一志.童幼教育[M].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C].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
- [11] 梅根悟.世界教育史大系·幼癩教育史[M].东京:講談社,1974.
- [12] 普鲁塔克.论儿童的教育[A].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 [13]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4] 韩霖.童幼教育序[A].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C].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
- [15]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6] 韩霖.铎书[M].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C].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
- [1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8] 马相伯.童幼教育跋[J].上智编译馆馆刊,1948,3(6):247.

[责任编辑 徐 枫]

Child Educ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ld Education Ideas from the West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XIAO L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Italian Jesuit A. Vagnoni set out on his journey to China in 1603. Two years later, he arrived

in Macao , then in Nanjing. Due to the Nanjing Missionary Incident , Vagnoni was expelled and banished to Macao. During his stay there , he taught such courses as theology at College of St. Paul. Meanwhile , he also wrote the book *Child Education* and had it published. Consisting of 20 chapters in two volumes , the book probes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child educa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example , the book discusses physical nurturance and mental education , covers family and school education , focuses on knowledge teaching and moral development , and concerns children 's study and their daily lives. It embodies the spirit and essence of education by introducing ideas of western child education and absorbing theories and viewpoints of child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For example , the book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y pregnancy and scientific nurturing to children 's growth and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parents and teachers in child education. In addition , the book pays close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in child education. It quotes extensively from the *Bible* , the recorded utterances by Pythagoras , Socrates , Plato , Aristotle , Zeno , Seneca , Plutarch , M. Aurelius , St. Augustine and I. Loyola , as well as traditional western mottoes and allusions. In the book , the stories about the education and the growth of many celebrities in Western history are enumerated. Noticeably , the book accepts the proper viewpoints of Greek and Roman educationists and is also influenced by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Attempts are also made to explain the Western concepts on child education by drawing on tho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is clearly indicates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author to integrate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ncepts on child education. After its introduction to Mainland China , *Child Education*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lligentsia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For instance , HAN Lin , a gentleman from Shanxi , wrote a preface for the book and quoted much from the book in his *Duoshu* . Chen Yuan , the famous modern historian , found the book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it. It had also been republished many times since then. In 1919 , the famous educationist , Ma Xiang Bo , wrote a postscript for it and illustrated it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aving the country by means of education". Academically , the book is undoubtedly a very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introduction of theories and ideas of western child education has yet to be further studied.

Key words : Alfonso Vagnoni ; *Child Education* ; Western ideas on child education

本刊讯 2005年6月3日 本刊特邀编委、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在浙江大学作了题为“《红楼梦》、龚自珍与中国新文学”的学术报告。章先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及博士生导师,此次讲座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主办,本刊编辑参加了此次学术报告会。在讲座中,章教授谈到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割裂所产生的问题,主张从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整个脉络来看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从而作出更全面的评价。随后,章教授还将他对新文学的理解介绍给大家,并以《红楼梦》和龚自珍为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